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学术通讯

Newsletter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No. 1 2012

总第二十一期

2012年3月20日，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第四十七场，由张佳助理研究员报告《塑造正统：明初的“胡服”禁革》（左图）；3月30日，小型学术研究会第四十八场，由朱莉丽助理研究员报告《日本遣明使记录下的明中叶江南城市和城市生活——以宁波为中心》（右图）。

2012年3月19日，葛兆光教授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做题为《谁是六祖？——读〈唐少林寺释法如行状〉碑》的学术演讲。

2012年1月30日至3月29日，王振忠教授应邀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担任客座教授，主持“明清社会文化史研究”十二讲。

目　　录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行记　/□朱　溢　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 …… 2

韩国访学记　/□王鑫磊　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 6

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四十六场至四十八场)

郑　怡　《霞客游记》与晚明知识转型 …… 9

张　佳　塑造正统:明初的“胡服”禁革 …… 10

朱莉丽　日本遣明使记录下的明中叶江南城市和城市生活:以宁波为中心 …… 11

“交错的文化史”研习班第十二、十三期简报 …… 12

新书介绍　《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祖先与永恒——杰西卡·罗森中国考古艺术文集》、《走向新的世界史》、《清代中国琉球交流史之研究》 …… 14

外刊撷英 …… 17

“第二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徽州”招生简章 …… 22

2012 年文史研究院专职研究员、博士后人员招聘启事 …… 25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纪事 (2012.01—2012.03) …… 26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行记

朱　溢
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

去年12月12日至今年1月20日，作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合作协议的一部分，我和同事董少新二人以交换教员的身份前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受到了所长羽田正教授、大野公贺特任准教授以及相关人员的盛情款待，并参与了所内和所外的一系列学术活动，收获良多。

东洋文化研究所（以下简称东文研）建立于1941年，下设三个部门，即哲学·文学·史学部门、法律·政治部门、经济·商业部门。1949年，东文研吸收了原来外务省属下的东方文化学院的一部分设施和研究人员，并将下设部门细化成哲学·宗教部门、文学·语言部门、历史部门、美术史·考古学部门、法律·政治部门、经济·商业部门。后来，东文研的下属机构建制又经过几次调整，特别是随着1960年代以后研究所的重心不再限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的研究被囊括进来，逐渐采用以地域来划分研究部门的做法。现在，东文研下设泛亚细亚、东亚、南亚、西亚和新世代亚细亚五个大的研究部门，其中东亚部门又分为第一、第二研究部门，每个部门下面又分成若干专题领域。例如，东亚第一研究部门之下有经济·政治、历史、考古三个领域，第二研究部门之下有宗教·思想、文学、美术三个领域。从2010年开始，东文研的英文名称从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改为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n Asia。东文研的教员们以研究为第一要务，同时在大学院人文社会研究科、情报学环·学际情报学府承担教学和指导硕士生、博士生的职责。在七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东文研历来是名教授云集。在中国历史方面，仁井田陞、江上波夫、周藤吉之、山本达郎、佐伯有一、池田温、斯波义信、松丸道雄、滨下武志等著名学者先后坐镇。目前，所里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主要有平势隆郎教授和小寺敦准教授，他们的专攻方向都是先秦秦汉史。

对我来说，此次访问东文研可谓故地重游。2008年6、7月间，当时还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候选人的我，受到学校的经费支持，去日本收集与我的博士论文有关的日文研究论著，主要的访问对象就是东京大学。访问期间，承蒙平势隆郎教授的热情接待，我得以借阅

东文研大楼

东京大学的各种图书资源。那次访问收获颇丰，给我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后来，这些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都被充分吸收进我的博士论文。对再次造访东文研，我充满了期待。

这次学术访问，赶上了东大一年中最美的季节。12 月的东大，遍地是落下的银杏树叶，尤其是在正门通往安田讲堂的主干道上。银杏树是东大的象征，东大的徽章就是由黄色和青色各一片银杏树叶构成。1912 年，在第八任校长滨尾新的任上，东大的主干道种上了银杏树，由此晚秋初冬的银杏成为东大乃至东京的重要景观。我们在一百年后来到被银杏覆盖的东大，真是一件幸事。

此次日本之行最主要的目的是收集与我目前的研究相关的资料。最近，我的研究主要围绕中国与周边政权的政治交往、文化联系在礼仪上的表现而展开。具体而言，一是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宾礼的研究，二是中国传统礼仪向周边国家的扩散及其受容过程。因为时间比较有限，我主要选择日本学者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为收集对象，原始史料的阅读和蒐集只能以后进行了。为此，我充分利用了东京大学的图书馆系统。

东大的图书馆系统主要由综合图书馆和各学部、研究所的图书馆以及各研究室的资料室组成。我使用比较多的是综合图书馆、东文研图书馆、史料编纂所图书馆和文学部图书馆。综合图书馆是学校的中央图书馆。旧的综合图书馆毁于 1923 年的关东大地震中，很多贵重图书几乎损失殆尽。为此，东大成立了图书复兴委员会。在他们的努力下，日本国内和国际上三十多个国家捐助了很多图书。在洛克菲勒财团的资助下，东京大学开始兴建新的综合图书馆，落成时间是 1928 年。在此后的八十多年中，综合图书馆又先后经历了为躲避战火进行的图书疏散、战后的改建等。现在，其藏书量约有 120 万册，杂志近 2 万种。常用的书在开架上可以找到，杂志和一部分书籍置于闭架书库。文学部图书馆的藏书量也是相当惊人，有超过 100 万册图书，位居各学部、研究所图书馆之首，有 1 万多种杂志，在各学部、研究所的图书馆中，规模仅次于经济学部图书馆。

2008 年我访问东大的时候，东文研的大楼刚刚进行了加固工程，图书馆正处在将图书重新搬入的过程中，所以无缘利用。这次终于有幸在东文研图书馆查阅资料。该图书馆位于东文研大楼的一角，占据了地上八层和地下一层，一共九层。藏书量有近 70 万册图书，近 7 千种杂志，尤其是在中文书籍的收藏方面，东文研图书馆是日本最重要的三家图书馆之一。东文研图书馆除了购买各类相关图书外，还接受了不少私人的捐助，比较重要的有大木文库（大木干一的藏书，尤其是以中国制度史、法制史方面的藏书最为著名）、仁井田文库（中国法制史学者仁井田陞的藏书）、仓石文库（汉语学家仓石武四郎的藏书）。除了东文研的图书馆，史料编纂所的图书馆我也是第一次利用。史料编纂所图书馆收藏了 50 多万册图书，近 3 千种杂志，主要集中在日本史方面。我想了解中国的一些礼仪现象在日本古代是否存在过，因此在史料编纂所借阅过相关文献。

12 月 18 日，我参加了东京大学文学部佐川英治准教授召集的“南朝建康与都城研究”学术研讨会。

中央大学

上午有三位学者报告论文。佐川英治准教授报告了《六朝建康的历史位置》,九州大学的专门研究员户川贵行博士报告了《东晋南朝建康城中皇帝的私的空间》,东北大学的专门研究员小尾孝夫博士报告了《六朝建康的墓域与都市空间》。下午,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张学锋教授报告了《六朝建康城研究三题》,我报告了《吉礼变迁与都城研究——以唐宋时期为例》。根据会议安排,相爱大学的中村圭尔教授对五篇报告进行了点评。除了几名论文报告者,此次研讨会还有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御茶水女子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国学院大学、德岛大学、埼玉大学、明治大学、立正大学、北海道大学、金泽大学、新潟大学、京都外国语大学、大阪教育大学、阪南大学等单位的学者出席,不仅有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者,也有日本古代史的研究者。由此可以想象,在日本学界,日本古代史研究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联系是多么紧密。在我的报告结束后,明治大学的气贺泽保规教授、国学院大学的金子修一教授、东京大学的佐川英治准教授向我提出了几个问题,与我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探讨。

12 月 21 日,受妹尾达彦教授和阿部幸信教授的邀请,我前往中央大学多摩校区进行学术交流。最初的中央大学在千代田区的神田锦町,后来长期使用骏河台校区。1978 年校址迁移,法学部、经济学部、文学部、商学部迁至八王子市的多摩校区,理工学部迁至文京区的后乐园校区。多摩校区紧挨着明星大学,因为远离东京市区,环境非常宜人。中央大学以法学部最为出名,文学部的东洋史研究也颇有传统。东洋史学研究室建立于 1951 年,青山定雄、中村治兵卫、菊池英夫、池田雄一等著名学者先后执掌教鞭。上午,我在阿部幸信教授的博士生课程上讲授了唐宋太庙制度的变迁,并与阿部幸信教授、修课学生进行了探讨。下午,我在人文科学研究所报告了《唐至北宋时期的皇帝亲郊》,报告由妹尾达彦教授主持。除了中央大学东洋史方向的师生,国学院大学的金子修一教授也特地赶来,出席了我的报告会,并参与了讨论。

1 月 12 日下午,我和董少新在东文研举行讲演会。讲演会由羽田正所长主持,另有两位东文研的年轻学者担任翻译。先由董少新报告《清朝宫廷中的西洋医学》,卯田宗平讲师担任翻译,后由我报告《公私之间:唐宋太庙礼仪的变迁》,大野公贺特任准教授担任翻译。在自由讨论部分,羽田正教授、平势隆郎教授、小寺敦准教授等学者就报告内容与我进行了探讨。

1 月 13 日,应平田茂树教授的邀请,我前往大阪市立大学访问。大阪市立大学的主体部分位于住吉区,几乎是在大阪市的最南部,离大阪府的堺市很近,校园非常静谧。大阪市立大学的前身是大阪商业讲习所,因此商学部极富盛名,文学部史学科在日本和国际上也是颇受好评。东洋史学研究室建立于二战后,天野元之助、中山八郎、佐藤武敏、中村圭尔等著名学者曾在那里执教过。14 日,我应邀参加平田茂树教授主持的宋代史谈话会。宋代史谈话会主要有关西地区的

大阪市立大学

宋史学者参加，有时也会有其他地方的学者出席，定期由一至两位学者报告自己的研究状况。立正大学兼任讲师中林广一博士和我在谈话会上进行了报告，中林广一博士报告了《吴越国的江南三角洲开发》，我报告的题目是《走出郑、王之争：唐宋郊庙礼制的发展趋势》。针对我的报告内容，平田茂树教授、立命馆大学的松本保宣教授与我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四十天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在此期间，我除了收集资料、参加学术交流外，还碰上了东京大学开放日、圣诞节、元旦（日本不过农历春节，只过元旦新年）、成人节、日本全国高考等重要节假日，这些让我对学术圈以外的日本有了更多的了解，也为此次日本之行增添了不少美好的回忆。在此篇学术游记的最后，我要向此次访日期间帮助和照顾过我的各位前辈、同仁，特别是羽田正教授和大野公贺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韩国访学记

王鑫磊
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自进入文史研究院工作以来，我一直围绕研究院“从周边看中国”的方向，开展与韩国相关的历史研究。然而，对于韩国的历史文化、中韩交往的历史背景等，仅仅通过文献阅读形成的认识，总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而经由学术合作的关系几次前往韩国的经历，又都因为时间太短而浅尝辄止。终于，在2011年初，我得到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国际学术交流支援项目(ISEF)”的资助，于2011年9月至2012年2月间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开展了为期六个月的访学活动。

接受我前往访学的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是一个我神往已久的地方。它是目前韩国古籍收藏数量和质量都首屈一指的图书收藏机构，我在2009年前往韩国访问时曾有幸造访奎章阁，当时就被其藏书规模所震撼。奎章阁提供给访问学者的条件相当优厚：提供专门的研究室，开放利用馆藏资源的权限，邀请参与各类学术活动和团队拓展活动。在奎章阁，我结识了我的合作教授、奎章阁国际韩国学中心主任朴泰均教授，还有供职于奎章阁、任教于宗教学系的Sem Vermeersch教授，他们两位都是平易近人、温文尔雅的学者，虽然因为研究方向并不十分相近，我们在具体研究课题上的交流有限，但他们给予我大量的指导和帮助，让我很快适应了奎章阁的研究环境，并顺利展开自己的研究。

我在奎章阁的资料检索和收集工作，除了希望能对馆藏文献资源有一个面上的把握，也有一些具体的目标。首先是收集与我所提交的研究计划即金允植天津领选活动有关的资料，我希望在金允植本人的文献资料之外，收集与该事件相关的其他一些人物的资料，这方面的工作颇有斩获，而在浏览资料的过程中，我还无意间发现和金允植自天津归国以后创办的韩国历史上第一家机器局相关的一种日记材料，更让我如获至宝。其次，我在奎章阁进行文献检索的另一个重要的目标是查找通信使文献。所谓通信使文献，简言之就是韩国历史上由官方派往日本的使行人员所留下的文字记录。这项工作主要是源于我院继出版《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之后，想要继续在中国大陆介绍出版韩国通信使文献的设想，我希望借此机会先做一些文献状况的摸底。有关通信使的文献，最早在朝鲜王朝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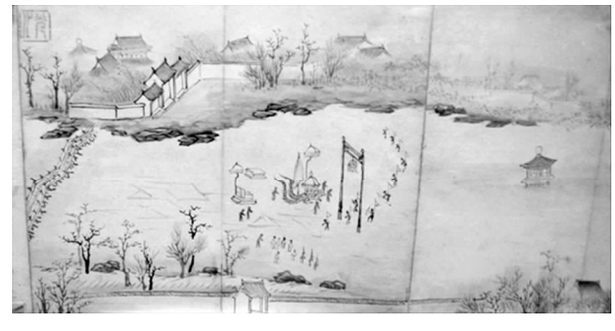
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

期,就曾被整理合编成一部《海行总载》出版,而这一部《海行总载》也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有了国译本(即将汉文原本翻译成韩语版本)问世。尽管如此,通过对奎章阁馆藏资料的检索,我还是发现了一些属于通信使文献范畴但未收入《海行总载》的文献。同时在与一些韩国学者交流时,也得知近年来不断有此类新文献被发现。如果我们下一步的出版计划能够将这些文献纳入进来,无疑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另外,在查找通信使文献时,我还注意到一系列有关1881年朝鲜王朝向日本派遣的一支使节团队"绅士游览团"的文献。所谓"绅士游览团",是被朝鲜国王派往日本考察明治维新以后社会情况的使节团。他们留下的文献一般都以"视察记"、"闻见事件"为题名,数量约有二十余种,其原本都藏在奎章阁。这些材料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他们产生的时间和我所关心的天津领选几乎完全一致,即1881年。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朝鲜王朝差不多同时向中国和日本两方面派出了使节,其目的都是想要了解两个国家近代化变革的情况。如果把这两方面资料综合在一起,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实际上是呈现了同一个时间点上中日两国近代化的场景。结合我关于天津领选的研究计划,加上这部分资料的阅读,我完成了一篇题为《从"天津领选"和"绅士游览团"看东亚近代化场景》的论文,这篇论文在今年三月成均馆大学召开的"传统学问的瓦解和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相关内容在我访学结束后提交的研究报告中也有所体现。

也许学历史的人都有一个爱好,那就是每到一处都要到当地的博物馆去看看,我在韩国也是一样。我先后参观了国立中央博物馆、首尔市立博物馆、庆州博物馆、江华历史博物馆等。国立中央博物馆的韩国历史常设展是一个纵向全景式的历史呈现,各时期的精华文物的展示是最大亮点。首尔市立博物馆的有关朝鲜时代中人阶层成就的特别展,旨在提示在关注占社会主导地位的两班士人阶层的同时,也不应忽略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中人阶层的贡献。庆州博物馆的所在地庆州,正是古代新罗王朝都城,大量考古发掘遗物完整地呈现了古代新罗文化的发达和繁盛。江华历史博物馆位于江华岛,韩国近代史上与日本以及法国、美国的接触和冲突,都以这个岛屿为中心展开,而该博物馆对这段历史的呈现也最为淋漓尽致。

在韩国看到的所有博物馆展览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要数国立中央博物馆的一个名为"燕行使中的画家"的特展。这个展览展示的是历史上跟随燕行使团前往中国的随行画师的画作。因为我以往关注燕行文献,看到的主要都是文字材料,涉及到的图像资料微乎其微,而这个展览呈现出来的,恰恰是能够和以前看到的很多文字材料相印证的图像资料,其价值不言而喻。举一个例子来说,我曾经在一次报告中提到燕行使节在热河行宫观看冰戏的情节,根据文献记载,我们只能大概知道冰戏是一种在冰面上进行的类似军事队列操练的表演,而在这个展览中,就有一幅直接描绘冰戏场面的图画,从而让我有了一个直接的认识,远远超出了文字所能够传达的信息。看完这个展览,我前所未有地感受到将图像资料作为史料加以关注和利用的重



瀛台冰戏图

海印寺八万大藏经经板

要性。

当然,在韩国的半年间,我也尽可能利用空闲时间到各处走走,主要是为了丰富对这个国家的认识,同时锻炼自己的语言能力。我有时会一个人背包上路出远门,从一开始只能简单问路,到后来可以和出租车司机从上车聊到下车。在韩国各地旅行时,我去的最多的是寺院,韩国多山,藏于深山的寺院往往能够躲避战乱的破坏,因此寺院建筑往往都是保存相对完好的文化遗存,在韩国的国家国宝名录中,几乎近一半是和寺庙相关的文物,这一点并非偶然。在博物馆陈列之外,我在韩国各处实地看到的国宝级文物共有十九件,其中印象最深的当属藏于大邱迦耶山海印寺的八万大藏经经板。十三世纪的高丽王朝将传自北宋、契丹的大藏经版本和高丽高僧添加的内容综合在一起,雕刻在 81 340 块木板上,一直完整保存至今,八万大藏经现为韩国国宝第三十二号,是其引以为傲的文化遗产。

当为期半年的访学接近尾声之时,我唯一的感受就是时间过得太快,似乎还有很多当做未做之事,虽有不舍,但也并无遗憾,因为这半年时间,我已经收获了许多,接下来我可能需要用更长的时间来消化和吸收这些收获。这段时间所增长的见闻,积累的知识,结识的朋友,无疑都将成为我最重要的财富。我庆幸我的人生中有这样一段经历。□

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

（四十六场至四十八场）

《霞客游记》与晚明知识转型

郑怡　悉尼大学语言文化学院高级研究员

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把徐宏祖（1586—1641）的《霞客游记》当作晚明对阳明学派的反动。在梁看来，《霞客游记》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算得反动初期最有价值的作品”。但他认为这不过是“一两个人、一两本书，不能代表时代”。而徐的《霞客游记》在现代常被看作晚明闲适文学的范本。这种对徐氏文本美学及文类价值的关注虽然有助于了解明末文人情趣与时代风尚的关系，却不曾把徐氏“记录”、“观察”地理山水的“艺术”算作当时知识史与认知方法时代性大转变的一部分。正如梁氏认为徐“自然科学的反动”之书为“怪书”，现代游记文学研究往往把徐对自然山川的兴趣和记录看作奇人奇趣。

本报告拟在近代全球性世界观及知识史大转型的背景下，对徐氏对实地、实测、实证和勘误的强调，及其三十年如一日在山水间奔波劳顿对“正确”知识的追寻，来探讨晚明知识结构、认知方法的变化与世界性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尤其是“物”的泛滥与“人”的移动的关系。其中重点探索的问题是，徐及同期的士人“实证主义”式的认知倾向与近世全球化的关系，包括方法论（认知成为过程）及知者身份的（自我）界定、静态与动态知识的区分等。

徐的游记定义并体现了一种对知识、认知过程的不同理解和实践。除寻求确切测量表述地理现象的术语和方式外，徐对细节的追求不仅表现在他对所见所闻的描述中，更为重要地表现在他记录怎样探看、了解、认识的过程中。徐所记录的实际上是一种永不完结的运动过程。他对所谓“近”——准确性的追求，既是审美层面的，也是认知所需，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对身体、认知和情感过程的描述。在徐的游记中，“行”（运动）本身成了一种价值取向，对于认知过程和认知者的自我界定都同样重要。也许我们可以说，徐的文本体现了知识追求的过程，它的先驱性是在文类及传统变化之间，而非在其对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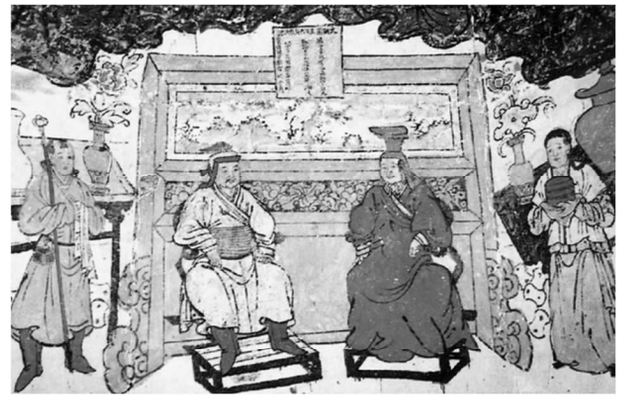
塑造正统：明初的“胡服”禁革

张佳　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明代建立之前，中国北方经历了金、元两个半世纪、南方经历了元代近一个世纪的统治。金元时期各族群文化的交融，是一个双向“涵化”（acculturation），而非单向“同化”（assimilation）的过程；其中既有外来族群的“华化”，也有汉族的“胡化”。从衣裳冠履到伦理观念，金元时期汉族生活习俗，同样受到少数族群的深刻影响。随着各族群间习俗、文化上的界限逐渐模糊，汉族传统的“夷夏之防”的观念也日渐淡化。根据钱穆的研究，只强调“君臣大义”而无视“华夷之辨”，是元季士人的普遍心态，这构成了明初所面临的政治认同危机的思想根源。

朱明集团脱胎于元末红巾武装，甚至直到建国前两年（1366），在名义上仍然和红巾龙凤政权（1355—1366）保持君臣关系。由于红巾集团特殊的军事与文化渊源，元季士大夫普遍对其缺乏好感，多称之为“红贼”、“红寇”乃至“红妖”。如何论证新政权的合法性、争取士人阶层的认同与支持，成为明初开国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为此，明初重拾士人久已淡漠的“夷夏之辨”的传统命题，试图在儒学的夷夏理论当中，寻找元明易代的合法性基础。“用夏变夷”、“复中国古先帝王之政”，成为明初政治的两个关键词。洪武时期的胡服禁革，便是在以上的思想和社会背景中展开的。

洪武元年二月，即位仅三十八天的明太祖他务未遑，通令全国衣冠复古、革除“胡服”。“辫发椎髻”、“深檐胡帽”、“辫线腰褶”、“窄袖短衣”等蒙古发式和服饰，乃至“胡语、胡姓”，概遭禁止；纱帽、方巾、团领衣等，被确立为新朝的服饰典制。明初的“去蒙古化”政策，抑制了金元以来汉族社会生活“胡化”的趋势；服饰重新成为标识族群身份的符号，“华夷”之间在文化乃至心理上的界限，又被重新刻画出来。借助服饰革新，朱明政权不仅塑造了自身“华夏正统”的形象，还陪衬出了一个迥异于汉族传统的“胡元”王朝；元明易代，在儒家夷夏意识形态里获得了天然的合法性支持。



陕西蒲城县洞耳村元代墓室壁画（1269）

明初建立的新服饰体系，很快被高丽、琉球、安南等周边国家接受，并被看作是华夏文明的标志。与蒙元建立在军事威服基础上的宗藩关系不同，明代与周边国家宗藩关系的确立，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服饰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更有甚者，丽末鲜初，深受蒙古化影响的朝鲜半岛也以明朝为样板，掀起了一场号称旨在“用夏变夷”的文化变革浪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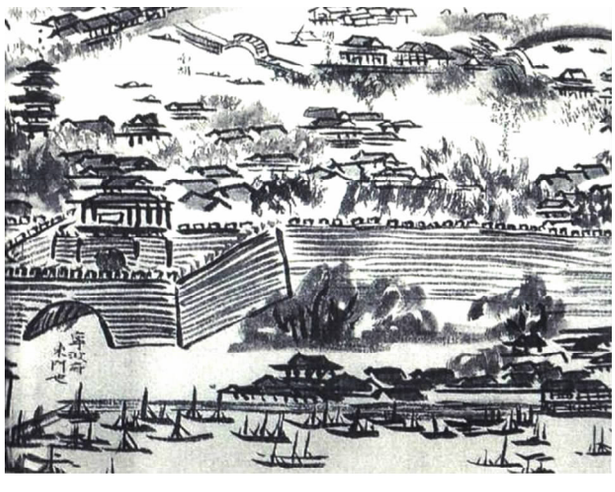
日本遣明使记录下的明中叶江南城市和城市生活

——以宁波为中心

朱莉丽　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近年来,学术界尤其是日本学术界针对宁波展开的专题研究非常多,这与宁波在古代中日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历史上的宁波在中日交通中地位的凸显始于中唐。当时,从岭南、福建等地以及日本来的海船,在明州驻泊后,改乘内河船,经浙东运河至杭州,与大运河对接,直达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扬州。而中国的商人也从明州出发往贩日本。宋元两代宁波的对外贸易亦十分发达,其中大部分是与日本的贸易。明代虽然禁止私人从事海上贸易,但因为专接日本贡使的浙江市舶司设在宁波,使宁波在中日交流中的重要地位得以维持。宁波这一明代对日交流的唯一窗口,屡屡出现在日本遣明使节来华期间的记录中。这些记录从与中国史料不同的视角显现了当时宁波的城市风貌。

报告选取了嘉靖十八年到中国朝贡的遣明使团副使策彦周良的出使日记《初渡集》作为主要的切入点,同时辅以他的另一部出使日记《再渡集》,以及同为遣明使的笑云瑞饡的《笑云入明记》和朝鲜漂流人崔溥《漂海录》中的记载,以策彦周良在宁波的活动为主线,将他的见闻与活动特别是他与周围人的互动连缀起来,勾勒出一幅嘉靖中期宁波城市和城市生活的画卷。



雪舟等扬《唐山胜景画稿》中的宁波城门

作为遣明使的策彦周良,不仅对宁波的城门建筑、官僚设施、教育机构、宗教场所、街道商铺等城市设施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描述,同时以自己的活动为中心,将与自己交往的宁波士大夫阶层的日常生活面貌呈现出来。对照中国政书、方志以及明人笔记小说中的记载,我们会发现遣明使节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描述的真实性非常高,与此同时又保留了一些中国人自己所忽视的细节。比如策彦记载,在官署中,官员们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体悟,将一些字句贴在公堂里,鼓励自己奉公守节、秉公办案。这种现象至少为我们还原明代官场社会的风貌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补充。而遣明使这一特殊人群在宁波的活动本身,亦成为明代前中叶宁波城市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作为港口城市的宁波,对海外来客和外来文化的接受度和兼容度都超乎今人的想象。而宁波士人与日本人的交游,成为宁波城市生活中一道不同于当时中国其他城市的独特风景。

总之,通过遣明使节和崔溥的在华日记,我们看到了同属汉字文化圈,与中国在文化上具有同质性的两个国家——日本和朝鲜人眼中的明代中国。这种来自域外的观察既可以成为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有益补充,同时又是当时中外关系的一种客观反映,值得重视。□

“交错的文化史”研习班第十二、十三期简报

为促进院内博士后、博士生与教师之间更充分的交流讨论，从2012年开始，文史研究院建院以来持续每月举行的博士后论坛，正式融入由本院“交错的文化史”工作室成员定期组织的研习班。该研习班旨在围绕在研课题进行深度交流，推动研究经验与跨领域知识在研究者之间的共享，同时也发掘课题可能的拓展方向。

2012年3月13日下午，我院“交错的文化史”工作室举办第十二期研习班，助理研究员王鑫磊围绕最近撰写的一篇论文《从“天津领选”和“绅士游览团”看东亚的近代化》做了主题报告。报告提到，1881年朝鲜王朝向日本和中国各派遣了一支使节队伍，是为绅士游览团和天津领选使。从这两支使节队伍留下的文献记载中，实际上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近代化变革之后，社会各层面所呈现的很多真实的、细节化的场景，这对我们从对比中进一步理解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努力及其取得的成果有一定的帮助。而来自朝鲜王朝观察者的视角，也反映出一些问题，比如当时在近代化步伐上相对滞后的朝鲜王朝，对近代化的观感如何，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场景，对其又有怎样的影响等等。同时，发言中还提到了韩国所留存的汉文历史文献对于研究中国和日本两国历史的学术价值，以及韩国在东亚三国的历史中所扮演的桥接角色。

报告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历史系司佳老师提到了文化比较的问题，即朝鲜王朝观察者的记录中是否会将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进行一种对比，并做出孰优孰劣的价值评判。对此报告人回应，目前所见到的材料主要是对于客观情况的记载，价值评判性的文字较少，而前往中日两国的人员并没有交叉的情况，因而就观察者而言没有进行比较的条件。至于是否会有同时看到两方面记录的人来作出比较和评判，这种可能性或许存在，但目前还没有相关材料的支持。朱坤容博士提出如何理解韩国在东亚三国历史中扮演的桥接角色的问题。报告人表示，在东亚三国的历史上，中国和韩国的关系长期比较密切，而中国与日本在一定时段内交流相当贫乏甚或中断，反倒韩国和日本之间基本没有联络中断的情况。所以，经由中—韩—日的这种关联，仍然有可能将两者联系起来。比如元朝时曾有

日本使者经由朝鲜使节带领前往元朝朝觐的事件。另外,从文献的角度看,韩国留存的文献中存在大量能够同时反映出中国和日本两方面情况的材料,也可看作是一种桥接的体现。葛兆光老师指出,报告中提到的两个事件发生的同时,有很多中国人恰好也在日本,比如文廷式,并且这些人也有一些观察记录留下来,如果可以将这部分内容纳入,研究将会更加充实。

3 月 27 日下午,博士后朱坤容在第十三期“交错的文化史”研习班上报告了她的研究课题《日僧道元从中国带回了什么?——试论日本早期曹洞宗宗风之成因》。

宋时,日僧入宋求法对日本的佛教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就有道元在天童山如净禅师下得到法嗣,其归国后创立日本曹洞宗。有观点认为道元禅是否定宋代禅而以唐代禅为理想模式的复古禅,那么道元在日本建立的曹洞禅是否与从中国带去的禅宗本质一致?在道元主持曹洞宗的初期,其道不显,其名不扬,而在其圆寂又相隔两代主持后,宗风改变却信众大增,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说明了怎样的问题?报告人试图通过此问题来开显出道元禅的意义,从而对早期日本曹洞宗(即道元、怀奘、义介三代)宗风的形成做一探讨。

对于早期曹洞宗未能广泛流布这一点,报告人认为有三个层面的因素。首先,从道元禅的修道方式来看,“为务打坐”的禅风与日本佛教为国家与社会服务的倾向存在着距离。其次,镰仓时期的佛教世俗化使得道元的禅风不合时宜。道元生活的时代,已是贵族、宫廷文化凋零,天下群雄逐鹿的镰仓时期。佛教被纳入到一个更为世俗化和注重现实利益的层面。最后,宋僧如净的“居深山幽谷”,“养佛祖圣胎”的训示对道元禅的出世倾向有着直接的影响。所以,确切说,道元的禅风继承的是以如净为代表的曹洞宗默照禅的支脉。进一步而言,道元原封不动地沿用宋土的规章仪轨,并试图将普佛思想移植到日本。但同一种事物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并不完全兼容,这是由文化特质所决定的,道元的弘法自然受到了日本本土文化的冲击。所以,道元只是如实地继承了如净禅,而更具日本性格的曹洞宗应该是从其曾孙绍瑾时才开始的。

报告之后,在座参与者就此提出了许多问题,如董少新老师较为关注佛教内部宗派划分的情况;芮传明老师提出宗教派别在亚洲的演变的问题,比如佛教流派从印度到中国再到日本、朝鲜的演变的概貌;王鑫磊老师提出了具体的研究建议,比如聚焦从如净到道元的这一段历史,从对照禅宗在中国与日本的流变来契合“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课题等。□

新书介绍

• “复旦文史专刊”第四种《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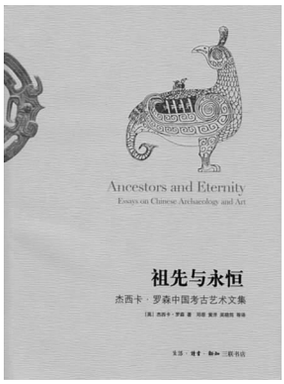
历史研究以时间为序，也以空间为界。过去的历史著作常常以“世界”或“国家”为名。世界史（world history）无所不包，论述空间的边界仿佛不是问题，但近来也有学者提出，看似全面的“世界史”，其实，常常是有圆心（撰写者位置和立场）、“远近”（距离撰写者圆心远近决定不同详略）、“边缘”（重点论述与一般概述）的，如果没有轻重详略，便只是各个国家历史的集合，所以，还不如强调联系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而国别史（history of state）以国界为界，看起来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由于国家“领土”在历史中也常常移动不居，很多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只是晚近才逐渐确定的，因而“历史”并不乖乖地拘守在现在的“国家”（领土）内，即使“政治权力”常常与“国家版图”重叠，但文化、宗教、经济却常常越出国界，这使得国别史的写作遇到困难。

就是在这一学术史背景下，历史学家试图重新寻找一些描述历史的空间。在这方面，我们要承认年鉴学派史家布罗代尔（一译布劳岱，Fernand Braudel，1902-1985）的影响，他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讨论的是十六世纪地中海周边诸国尤其是土耳其和西班牙的历史，他以“地中海”为空间，描述了一个在种族、宗教、政治冲突与融合上异常复杂的区域历史，这部名著给历史学界的启发之一就是，以海路交通作为纽带，把环东海周边作为彼此有关联的网络，是否也可以形成一个新的“历史世界”？

这便是羽田正教授建议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合作召开一次“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学术讨论会的由来。我想，羽田正教授正是因为世界史研究的兴趣，和对重写区域史的思考，提出这一研究设想和会议主题的。我当然同意对这一设想和主题进行讨论，尽管我和羽田正教授的学术背景、思考方向和关注重心不一样，但是，我们都觉得这种差异恰恰可以呈现讨论的意义，相反彼此相同反而淡化了交流的价值。有趣的是，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就清楚地看到彼此的差异。日本学者显然深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像冈元司教授讨论环境，吉尾宽教授讨论季风、海流、航路，中岛乐章教授、向正树教授讨论贸易，藤田明

良教授讨论居住、移民和产业，显然来自布罗代尔的启发，布罗代尔《地中海》一书第一部分就是描述原地中海沿岸的自然环境，第二部分就是讨论地中海沿岸的经济和社会。而中国学者则不同，在这一会议上，他们更多讨论的是东亚的文化和政治（张翔、陈波）、诸国之间的相互认识（朱莉丽）、以及社会与风俗（王振忠）。在这些微妙区别中，或许可以看出中日学术世界的不同。当然，可能更要提到的不同，是对于区域史和国别史的认知差异。一般来说，日本学者比较接受区域史研究的新趋向，这也许和他们兼涉亚洲的东洋史传统有关，而中国学者却比较恪守国别史的传统，这也许和中国史本身的自足性有关。我们很有兴趣进一步探讨，这种学术取向的差异背后，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当然这里不能简单评说，更不能轻易下什么结论。但很让人高兴的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愿意接受歧见，而且也乐意彼此沟通，尽管是否真正能够完全相互理解，也许尚需时日，不过，沟通就是理解的开端。（葛兆光教授序，中华书局 2011 年 12 月）

• 杰西卡·罗森著、邓菲等译《祖先与永恒——杰西卡·罗森中国考古艺术文集》



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1943— ）教授是中国艺术与考古领域最为杰出的西方学者之一，在过去的三十五年间，先后担任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以及牛津大学考古系教授等工作，致力于中国考古与艺术的研究，特别是中国物质文化的发展及其与地中海沿岸文明的差异。本文集收录罗森教授的研究论文 17 篇，是作者对古代中国艺术的思考与见解，如成套青铜器与商周礼仪、上古玉器的保存及重新使用、商代至汉代整体墓葬形式的演变、西方与东亚装饰传统的比较研究，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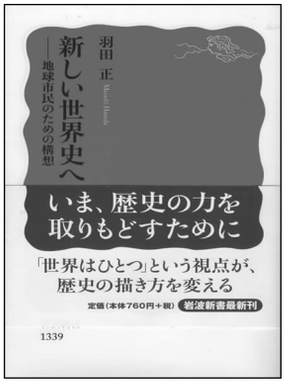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青铜器是作者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集中于两个方面：成套青铜器在礼仪活动中的作用，以及后世对早期青铜器器形及纹饰的复兴。公元前九世纪左右青铜器器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商代及西周早期对成套青铜器的使用在此时突然中断，新的器形开始流行，并以多件重复的方式构成器物组群。这些新型的青铜器可能对应着礼仪活动中的新变化，不单是礼仪上出现了重大变革，贵族阶层的社会结构也可能发生了变化。在这样的观点下，这些器物不仅有助于理解特定时期的物质文化，同时也有助于理解与这些青铜礼器相关的信仰和习俗。

如果希望更深入地透过早期器物来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及观念思想，各个时期的墓葬可以提供另外的线索。自秦代以来，墓葬成为墓主人的微缩宇宙，可以通过比较商代与汉代的墓葬来理解上述变化。汉代贵族以漆器和玉器取代了成套的精美青铜容器，这些器物又与侍从墓俑或陶俑放置在一起。随葬品上的这种变化反映了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和信仰上的转变。汉代墓葬的改变一部分源自于楚国习俗的影响，一部分可能来自于更遥远的西方、中亚地区。墓前的动物雕塑及凿山为藏的石室墓对石材的使用，都表现了中国与中亚及伊朗地区的联系。实际上，中国在秦汉时期已经作为世界的一部分，进入了全球化的早期阶段。

通过对中国早期青铜器、玉器以及墓葬的分析，作者将欧亚大陆大致分为三个主要区域：最东端的是中国及其影响所及的韩国、东南亚等地；最西端为地中海沿岸地区及其影响的北欧及西亚等地区；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是中亚广阔的沙漠和连绵的山脉，以及现今俄罗斯、蒙古地区的草原地带，在该区域内，游牧民族及商贾使中国与西亚间的交流得以存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年 12 月）

• 羽田正《走向新的世界史：塑造地球公民的构想》（新しい世界史へ——地球市民のための構想）

这是一本关于世界史的书，但并不以普及世界史的知识为目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会颠覆读者既有的世界史常识。通过本书，作者想要告诉读者这样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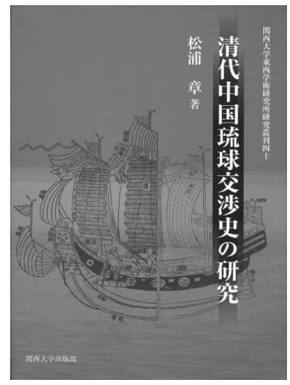
信息:如今我们所认知的世界史已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而不得不构想一个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新世界史”。什么是对世界史的认知?我们所秉持的世界史认知是什么?“新世界史”又是什么?应当如何书写“新世界史”?作者近年来始终在反复思考这些问题,而本书就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晶。

审视二战前日本皇国史观对国家命运的影响,或19世纪欧洲各国的历史叙述对建立民族国家的推动,都可以发现历史与现实社会之间紧密的联系。历史虽说并不像科学技术那样能与日常生活的改变发生直接联系,但历史学所催生的历史解释却会在更深的层面以相对静态的方式对人类的世界观产生影响,使人类社会的组织和行为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当代学术研究领域的细分化使得历史学往往陷于冷僻的考证。曾经的一些关注点现在大多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难以和当下的社会发生联系。羽田教授认为,历史是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对过去的追问,通过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决定未来的路要怎么走。然而,人们看待历史的眼光是不断变化的,这使得历史学的阐述方式也需相应地发生变化。在全世界互动与联系愈发紧密的当下,人们追问过去时所需要的视角就是“地球社会的世界史”——舍弃狭隘的国家身份认同,确立自身作为“地球公民”的归属感,并在这一基础上书写“新的世界史”。

本书由三个部分组成:我们学习和了解的世界史;世界史与时代之间的抵牾;新世界史的构想。羽田教授在书中谦虚地指出,他的构想并不是一个已经成熟的思考,因而未必合理。他更希望这本书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对“新世界史”更多的关注和讨论。(岩波书店,2011年11月)(邢云)

• 松浦章《清代中国琉球交流史之研究》



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清朝几乎统治着整个中国的国土。与传统的中华帝国一样,清朝作为中华帝国的盟主,和周边诸国维持着朝贡关系。日本虽然不是朝贡国,却以中国商人来往长崎进行贸易这种形态,维持了中日间两百多年的交流。然而在嘉庆《钦定大清会典》卷三十一中,礼部把对中华帝国进行朝贡的传统的“四裔朝贡之国”和“互通市”,即进行相互贸易的国家“互市诸国”进行了分类。虽然贸易的地点不是在中国国内,而是在日本长崎,但是日本还是被划入互市诸岛之列,且被清朝视作朝贡体制的一部分。

与此相对,作为清朝中国的朝贡国琉球国来说,虽然其领土被并入明治日本,但是琉球国在明代以后的五百多年中一直是中国的朝贡国。本书以清代中国和琉球国的交流为探讨对象。第一编“清代中国·琉球关系中的使节往来”,以康熙年间被派遣到琉球的汪楫为中心,讨论了清代中国如何选拔向琉球国派遣的册封使节;第二编“清代琉球使节的客死”,对琉球副使阮廷宝以及督通事郑文英的客死进行了阐述,并对在福州的“琉球人之墓”有所触及;第三编“中国·琉球关系中的漂着商船”讨论了清朝会典中关于漂流人救助的问题,也考察了当时因漂着而形成的《白姓官话》,以及同治十二、十三年上海的琉球漂流船;第四编“清代中国和琉球国物流的各个方面”从朝贡贸易衍生出的贸易中,对中国如何看待琉球国的问题进行了研究;第五编“清代中国·琉球关系的各个方面”讨论了作为清朝中国典型的朝贡国——朝鲜和琉球——之间存在的情报交换,并介绍了对福州琉球馆进行实地考察的情况。(日本关西大学出版部,2011年10月)□

外刊撷英

《阮辉▮〈皇华使程图〉考释》(Vài nét về tình hình văn bản *Hoàng Hoa Sứ' Trình Đồ Bản* của Nguyễn Huy Oánh), Nguyen Thanh Tung,《汉喃杂志》(河内),2011 年第 1 期

在阮辉诉的作品中,《皇华使程图》占有重要地位,它是越南现存最早的使程图之一,绘制了越南使团出使中国期间详细而生动的沿途光景。更早出现的还有《皇华图谱》(吴时任,1579),晚近的有《使程括要编》(李文馥,1841)、《燕使程图》(阮刻活,1876)、《如清图》(范文贮,1882)等。在 1963 年和 1994 年河内出版的《越南文化辞典》中,陈海燕曾做过初步考察和评价。该文试图对编著者、编撰过程、编撰体例、流传版本、誊抄者做进一步深入考证。

很长一段时间,学界大都认为《皇华使程图》撰于 1765—1766 年阮辉诉北使途中。然而《皇华使程图》的"题跋"中提到的"甲辰"年和"戊辰"年,经作者考订和判断,很可能是离阮辉诉出使时间最近的年代,为 1724 年和 1748 年。另外,从通篇各部分内容有无附文来判断,注有"乙酉等某年"校辑字样的部分系由阮辉诉在前人基础上校订而成,而无注释的部分很可能由其本人完成。作者进而断定《皇华使程图》并非由阮辉诉一人完成,系集体创作而成,早在 1724—1765 年间由多批出使中国的越南使团不断加工,最后由阮辉诉校订、注释、并与他本人创作的《使程总歌》(亦称《奉使燕台总歌》)比对,直至勘合完毕,这个过程从 1765 年一直延续到 1768 年。

关于《皇华使程图》的流传过程,《题跋》中有较为详细的说明。作者由此判定,该图版手稿很长一段时间内保存在族人子琼手中,后由阮辉诉后人阮辉瑑抄写保存,经考证推断为 1887 年。该版本至 1963 年始被发现并公布。2009 年在今义安省荣市最新发现了另一版本《皇华使程图》,收藏者系阮辉氏家族十五代孙,很可能是由其家族中名叫阮辉章的人传抄。

《越南李陈时期法律体系探微——兼论唐律与〈黎朝刑律〉之关系》(Hệ thống luật pháp triều Ly và triều Trần của Việt Nam — mối quan hệ giữ'a "Đư'ò'ng luật" và "Lê triều hình luật"), Yu Insun,《历史研究》(河内),2011 年第 1 期

越南李朝(1009—1225)和陈朝(1225—1400)虽颁有《刑书》,惜乎均已亡佚,相关法律制度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因此,该文将研究重心放在两朝记载较为清晰的五刑制度上,并与中国《唐律》加以比较,试图找出异同点,厘清《唐律》法律思想如何在李、陈两朝传承并发展成为《黎朝刑律》的脉络。

从越南现存最早的律例《国朝刑律》(亦称《黎朝刑律》)的内容和体例来推断,李、陈两朝律法几乎完全照搬唐律,如越南李太宗时期颁布的《刑书》和陈太

宗时期颁布的《国朝刑律》,都仿自唐律而成。而《黎朝刑律》受大明律的直接影响最为明显,同时也似乎可以看到宋朝律法影响的印记。作者认为《黎朝刑律》继承了李、陈时期的刑律,反映了越南律法虽模仿中国律法,但也大量保存了古已有之的习惯法,对于研究前近代越南社会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作者根据现存史料如《大越史记全书》、《历朝宪章类志》、《黎朝通史》、《安南志略》、《黎朝刑律》以及前人研究的成果,梳理并考察了李、陈时期五刑制度的异同点和继承关系。对比的尺度原则为"有无"、"刑罚严厉程度"和"提法相似或不同"等标准。作者认为,之所以产生差异性,主要缘于当时历史背景,李陈时期崇佛之风兴盛,官僚体系还未完全建立,法律体系尚不成熟,尤其是李氏王朝中央集权统治的背后,更多倚重具有神秘色彩的传统民间信仰和佛、道等宗教力量,陈朝的司法机关虽有所加强,但道、佛势力仍旧强大。而黎朝以儒教作为统治思想,尤其是黎圣宗模仿明洪武年间的政策,实行并强化中央集权制,从而导致《黎朝刑律》体现出黎氏王朝更为显著的王权特征。李、陈时期律法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唐律思想的影响,以及对后来的《黎朝刑律》产生多大影响?这一方面关系着越南人接受中国文化的态度,另一方面关系到国家机器的逐步完善对法律体系的建立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着蓑笠的孟宗——五山派僧侣影响下的"二十四孝"故事及其配图的演变》(蓑笠姿の孟宗—五山僧による二十四孝受容とその絵畫化をめぐって—),宇野瑞木,《東方學》第122辑,2011年7月

根据出土的敦煌文书,"二十四孝"结集成书最早可追溯至五代十国时期。而在日本,通过元、明以及李朝朝鲜传来的包括附属图录、诗歌和注释的"二十四孝"各种版本,逐渐以五山派僧侣为中心向周边的贵族和武家普及。在出版事业兴盛的江户时代,二十四孝最终在日本实现了大众化。而二十四孝广为流传的一个因素就是从室町时期开始逐渐日本化的二十四孝配图。日本现存的二十四孝作品大多为狩野派画家所作,着蓑笠的孟宗也是由早期的狩野派画家继承并将其典型化。孟宗由"文人"向"农夫"形象的转化就发生在室町时代的水墨画时期。而在这一过程中,五山派僧侣也对绘画产生了很大影响。

蓑笠这一意象脱胎于柳宗元的《江雪》。通过五山派僧人的著作可以发现,他们常将"孤舟蓑笠翁"这一形象联想为脱离世俗的隐逸生活,而文人隐士又常与茅屋和竹子相伴。从而能够想象在五山派僧人的语境中,"雪—蓑笠—水边垂钓"和"隐逸—蓑笠—茅屋—竹"是很容易结合起来的。

从这些僧人的诗作中也可以看出,竹子也为孟宗带来了"高洁"、"清廉"等精神内涵,而孟宗对母亲的牵挂和思念也往往融入了作者自身的乡愁。通过其他如黄香温席、老莱子娱亲等当时遗存的孝子故事画,也可以发现画作中对自然景物刻画的增多,而这则代表了对隐逸精神的强调。可以说,脱离世俗的隐者和佛道修行者在此实现了彼此间的互相融合。

在绘画所反映的时间差异上,可以发现孟宗逐渐从"发现竹笋"到"挖掘竹笋"的变化。这反映了当时"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的观念与日本固有的灵验思想的结合,从而加大了对现世报应的强调。

《日本遣明使与浙江巡抚朱纨——从《甓余杂集》看嘉靖二十七年的匿名信风波及诈骗案》(日本の遣明使節と浙江巡撫朱紈—『甓餘雜集』からみる嘉靖二十七年の投書及び金錢詐取事件—),Olah Csaba,《東方學》第122辑,2011年7月

策彦周良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被任命为遣明使,从浙江宁波登陆,当时负责接洽的是浙江巡抚朱纨。鉴于往年在与外来使节的贸易过程中诈骗案频频发生,为使周良等外来使节不受其扰,朱纨决定对宁波的商品交易实施严格监管,并对使节驻地嘉宾馆加强戒备。然而,即便如此,还是发生了匿名信风波及诈骗案两个事件。

作者通过《再渡集》和《甓余杂集》提供的史料还原了这两个事件的本末。在匿名信事件中,匿名者向遣明使居住的嘉宾馆投递书信,信中谎称朱纨和都司将放火烧毁嘉宾馆并谋杀遣明使,试图以此唆使遣明使先行刺杀朱纨和都司。而在诈骗事件中,名为胡纹、

赵荣臣的两名来历不明的中国人前往嘉宾馆与遣明使接触,分别骗得白银一百两、白银三十两。

由于朱纨致力于打击海盗、倭寇的私下交易,触动了参与非法贸易的闽浙富商和官僚们的利益,从而和士绅之间关系十分紧张。这两个案件的复原丰富了我们对朱纨政治活动的了解。首先,朱纨联合浙江按察司共同追究官员责任和查明事件真相,这一过程揭示出了当时宁波官员不履行职责、暗中勾结奸人的事实以及他们与朱纨的对立关系。而朱纨采取一系列惩治措施的意图也很明确,即藉此改善官员道德水准、重新挽回民众对官员的信任。其次,朱纨为使遣明使不受欺诈困扰做出了不少努力。他保证了驻地嘉宾馆的警备,并告诫使节不要与"奸人"接触,然而遣明使团成员不听劝阻,与牙行私自接触,结果与前任使节同样遭遇了诈骗。

《琉球中山八景〈城岳灵泉〉考——以清代册封使徐葆光所著诗作为中心》(琉球中山八景「城嶽靈泉」考—清代の冊封使徐葆光が詠じた詩を中心に—),平良妙子,《東洋学集刊》第106辑,2011年10月

明清时期派往琉球的册封使除了行使代表皇帝册封琉球国王的职权,往往还需要收集琉球的信息以便归国后报告给皇帝。知识阶层也往往通过册封使录和使节留下的诗文来了解琉球,这些记载从而影响了人们对琉球的观念和看法。日本虽然也有关于琉球的记录和研究,但册封使录的记载同样极大影响了日本人的"琉球观"。因此考察册封使对琉球的描述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对册封使常去的旅游胜地"中山八景"进行了考察,并以八景中的"城岳灵泉"为焦点展开分析。

如今的"中山八景"最早见于乾隆年间的册封使周煌所著《琉球国志略》,八景即"泉崎夜月、临海潮声、久米竹篱、龙洞松涛、笋崖夕照、长虹秋霁、城岳灵泉、中岛蕉园"。而关于"城岳灵泉"的记录最早见于康熙二十二年册封使汪楫的《使琉球杂录》。从他的记载中可以发现当时这座那霸港东南的小山还叫"灵岳","城岳"只是别称,山顶还有"贡舶舟子"所建祭神的小屋和可与名泉"瑞泉"相媲美的清泉。然而在康熙五十八年册封使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中,地名已变成"城岳",泉水被命名为"旺泉",只是房屋已经废弃。其他使节如李鼎元、周煌也都留有记录,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对"城岳"祭祀的功能有所记述。当地"以石为神"的风俗与中国大不相同,可以推测大概是因为祭祀独特所以才倍加留心。

八景中歌咏"城岳"的诗作以徐葆光为嚆矢。《城岳》一诗主要反映了他对祭祀活动的关心,《城岳野望》一诗则反映了他因当地农时与中国不同而引发的悲秋之情。而《城岳灵泉》一诗据作者考证,并不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歌咏首里城的"瑞泉",而正是歌咏城岳的"旺泉",前两句看似歌咏"瑞泉"的诗句实际是比兴手法的运用。

《副榜举人与进士教职——明代地方学官和乡试考官的一个特征》(副榜挙人と進士教職—明代における地方学官と郷試考官の一特徴—),三浦秀一,《東洋学集刊》第106辑,2011年10月

考中会试副榜的举人就任学官或在进士登第后被任命为学官,并以这样的经历入选乡试考官,这在明代是习以为常的。而本文则希望探究这一"惯例"背后的深层含义,并对其历史加以分析。

明代会试设立副榜最早见于洪武二十一年,洪武末会试副榜题名者就任地方学官已渐成惯例。若年纪尚轻(小于25岁),则可返乡或进入太学并参加下一届的会试。虽说时人都认为登第进士者实际上与考中副榜之人在才能上并无很大差异,但二者的尊卑之分依然十分明显。而且会试等第的判定往往会决定一个人终生的仕途。明代中期,科举考试的这一弊端逐渐凸显。一些题名副榜的人即使符合年龄要求也尽量选择不做官而继续读书应考,迟至正统年间这一风气已相当普遍。尽管此后朝廷多次强调年龄要求从而对此情况加以限制,但仍然有读书人以虚报年龄的方式进行规避。

明初乡试主考官的选拔并没有官职上的要求,景泰三年始规定由德才兼备的壮年学官担任。这反映了当时对题名副榜而就任学官者的期许:一般而言,副榜提名者都颇有才华,没有虚报年龄而就任学官更见其

品德高尚，可以说是担任乡试考官的理想人选。只是副榜题名者担任的考官逐渐由乡试主考官转变为同考官，品阶有所下降，而原先的主考官则逐渐由甲榜的进士担任。由此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关联。有明一代，即便三甲进士也会授予“正八品赐同进士出身”，而教官的品阶只有府学教授是从九品，其余皆无品阶，因而正德年间朝廷采取了进士保持原有品阶担任教职的措施。起初进士担任地方学官并没有一定的教职，后来逐渐以担任府学教授为惯例，且从担任学官到担任考官之间的间隔也大大缩短。由此最终形成了进士担任主考官，副榜题名者担任同考官的格局。

《圣窟观佛》(Seeing Buddhas in Cave Sanctuaries)，Sunkyung Kim，*Asia Major*，Volume 24，Part 1，2011

以小南海石窟为个案，本文探讨了如何在与观佛活动有关的物质遗产基础上来重构宗教实践活动。

小南海石窟在中国佛教石窟史上占有关键性地位。首先，它与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禅师、北齐文宣帝的导师僧稠有密切关系。其次，与其他大石窟不同，它标有建筑和重修的确切时间。作为那个独特文化时期的产物，小南海石窟所镌刻的《华严经偈赞》和《涅槃经》经文体现了北齐佛教发展的特点。为分析一个单独空间内的文本、图像、仪式所呈现出的复杂关系，小南海石窟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范例。

作者分析，僧稠的禅法“四念处”涉及《涅槃经》，这有助于解释出自该经的个别篇章何以镌刻在石窟外的显要位置上。另外，修持“四念处”并不需要带有鲜明色彩的图像，因为它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的基础上：身体、心智和感官的知觉仅仅是无常力量的偶然聚合。它们是烦恼、迷茫之源，因此将之视为虚幻是走向开悟的第一步。

与此不同的是，石窟内也存在很多色彩鲜艳的图像，描述了另一层次的宗教活动。其中，西壁的浅浮雕明显与《观无量寿佛经》有关。为解释这一现象，作者以石窟入口上方镌刻的《华严经偈赞》来说明，小南海石窟被视为一个佛教神祇曾莅临过的吉祥殊胜之地。而左外壁上出自《涅槃经》的偈赞则解释了开凿石窟的原因。作者进一步分析指出，石窟内部的佛像和佛土像具有观佛、佛前忏悔和赞颂圣地的功能，而镌刻的经文涉及到僧稠禅观最有代表性的方面。这些经文与相关图像一起，成为僧稠从事禅定教学的证据。

《追忆开元天宝：中古笔记小说中记忆图景的构建》(Remembering Kaiyuan and Tianbao：The Construction of Mosaic Memory in Medieval Historical Miscellanies)，Manling Luo，*T'oung Pao*，Volume 97，2011

作者以四部记录唐玄宗在位期间的逸闻琐事的著作为中心，来论述中古时期的笔记小说如何在编纂者的私人意图与文化背景的共同作用下，构建出关于开元、天宝年间不同于正史的、复杂多样的“记忆图景”。

第一个例子是李德裕的《次柳氏旧闻》，此书进呈于“甘露事变”前一年，服务于唐文宗对权力的诉求，书中不断强调皇权至上，并将唐玄宗表现为一个可以模仿的对象。此外，书中用于表现唐玄宗与重臣间亲密关系的篇幅约占三分之一。这些传闻将关键的历史时刻与政治角色，放置在私人的关系网络之中，使读者产生亲密的感觉。在他的笔下，同事、朋友及家族成员间零散的对话被重新包装，呈现出记忆图景的独特一面。

与李德裕对个人私密关系的展示不同，郑处诲的《明皇杂录》更多地强调公共价值观。作为成功的文学家和积极的朝臣，这一特定身份影响了他的表达。在此书中，富有才华的文学家取代了李德裕笔下关系亲密的重臣。同时，作者的注意力从玄宗身上转移到更为广阔的精英群体，代表了文人阶层的视角和品味。

第三个例子是郑棨的《开天传信记》，他不仅收集前代的逸闻，还加入了同时代的趣事。他对记忆的加工显示出逸闻是如何在模仿与重叠中成形。以对刘晏的记载来看，天才刘晏有着内在的才识与丑陋的外貌，但郑棨将其描述为聪敏貌美的才子潘岳的翻版。

最后一例是王仁裕的以纵欲和幻想为主题的《开元天宝遗事》。它体现出历史眼光如何影响记忆的书写。书中对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情爱细节、长安城中女性生活的平和、奢逸和慵懒，以及宫廷生活中各种感官画面的描写与勾勒，都意在呈现自我约束的缺失及纵欲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这一论调一直影响到后来的

文学作品对这段历史的表现。同时,它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唐代之后这段历史记忆与政治的关联逐渐消淡。

《六、七世纪文本中梁武帝佛教君主形象的描述》(Representations of Liang Emperor Wu as a Buddhist Ruler in Sixth- and Seventh-century Texts) Mark Strange, *Asia Major*, Volume 24, part 2, 2011

作者分析了六、七世纪描述梁武帝形象的三组文本,意在关注不同时代、不同政治、宗教环境下叙述策略的承袭和改变。他总结了三种不同的描述方式:第一种明确指出梁武帝是佛教君主,他对佛教的信仰导致了梁朝的衰亡;第二种将梁武帝描述为于公于私都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贤君,有意忽略他的佛教活动;第三种则认为梁朝的长期统治源于梁武帝对佛教的虔诚信仰。

六世纪下半叶,《魏书》、《金楼子》和《历代三宝纪》正是这三种描述方式的代表。《魏书》批评梁武帝的崇佛活动及其恶果,但仍认为梁朝覆灭主要是因为其昏聩,而非崇佛。《金楼子》作为儿子对父亲的褒赞,将素食解释为节俭、将潜心佛理解释为博学,由此将梁武帝与儒家传统贤君并列。《历代三宝纪》的作者费长房经历了周武灭佛,为向隋统治者弘教,将梁武帝塑造成佛教君主典范,并声称梁朝因此获得了佛法护佑。

七世纪前期,荀济《请废佛法表》(因经唐人编撰,作者认为代表初唐观念)、道宣《续高僧传》和何之元《梁典》发展了原有的叙述策略。荀济分别从道德、经济、政治等角度深化《魏书》对梁武帝的批评,并将梁朝灭亡归咎于崇佛,这和当时统治者对佛教的微妙态度有关。记载显示,唐太宗一直以梁武帝父子为前车之鉴。后来道宣以"沙门拜俗"政策引起的朝野争议为契机进行了回应。在他笔下,梁武帝信佛是为了长治久安,观点近似费长房;描述梁武帝博学、纯孝,从儒家传统寻求支持的方式则源自《金楼子》。和《金楼子》更像的是《梁典》,同样忽略梁武帝与佛教的联系,塑造勤勉博学的君主形象。

历史著作如姚思廉《梁书》、李延寿《南史》和虞世南《帝王略论》在七世纪中期延续了这一格局。作者对比了素食、不设牢牲和舍身等元素在不同文本中的叙述,说明北方背景的《南史》强调梁武帝"溺"于佛教导致的统治危机,南方背景的《梁书》则通过细节缺省和儒家化解释,将其描述成儒家贤君。

总之,梁武帝的形象服务于不同时代、不同描述者的立场和目的,但都沿袭了这三种描述方式,来讨论世俗皇权和宗教权力如何协调共处的问题。□

冯超、邢云、李熙、于薇、吴湛　摘译

“第二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徽州”招生简章

一、计划宗旨与目的：

2012 年 8 月 16 日至 8 月 27 日，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蒋经国基金会、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宋庆龄基金会等单位将合作举办“第二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徽州”。研习营一方面强调文献阅读和田野考察的结合，一方面也希望从不同的学术视野和学科训练来了解徽州的社会与文化。因此，在课程的规划上，除了徽州社会史的不同面向，也将宗教、戏曲、建筑、艺术与文学一并纳入，希望能藉此更趋近徽州社会与文化的原有复杂面貌。

二、计划主持人：

黄进兴、葛兆光、李孝悌、王振忠

三、主办单位：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蒋经国基金会

共同主办单位：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承办单位：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四、活动时间：

2012 年 8 月 16 日（周四）至 8 月 27 日（周一）。

五、研习地点：

上海复旦大学、徽州

六、学员资格与招收人数：

（1）学员资格：两岸本地及留学国外的文史学科、以及研究领域相关学科的博士生与大学青年教师。以去年未曾参加者为优先考虑。

（2）招生人数：正取台湾 20 人、大陆 15 人（包括相关学科博士生、大学青年教师、国外博士留学生）。正取人数，主办单位视情况酌予调整。备取若干名，依序递补。录取名单：台湾学员由中研院史语所与蒋经国基金会负责组成之委员会决定，大陆学员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负责组成之委员会决定。

七、研习费用：

（一）活动期间于当地之研习考察、食宿、交通费用由主办单位负担。

（二）主办单位另补助学员往返上海之交通费用：

（1）台湾学员：补助台北/桃园——上海之来回经济舱机票款，实报实销。补助上限为新台币 15 000 元。从他处前往上海之学员，经费也准此原则办理。

（2）大陆学员：博士生补助所在地往返上海之硬座卧铺火车票费用（如选择搭乘飞机，则依前述火车票款之额度支给）。年轻教师则补助所在地至上海之来回经济舱机票款。

（3）交通费用于活动结束后，检附相关单据于补助额度内核实支给。但学员需全勤出席，始予补助。无故中途离营者，将取消补助。

（三）学员自行负担：证照及其它个人消费。

八、授课师资（依姓名笔划排序）

卞　利（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教授）

王振忠（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

劳格文（John Lagerwey）（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

阿　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范金民（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郑振满（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郑培凯（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教授）

唐力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徐澄琪（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艺术史系名誉副教授）

常建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龚书章（交通大学建筑研究所教授）

九、课程内容

日期	上午	下午	晚上
16 日		复旦大学报到	欢迎宴暨师生见面会
17 日	8:30—9:00 开幕式 9:00—10:30 唐力行/传统徽商与近代同乡组织 10:40—11:40 提问	14:00—15:30 王振忠/徽州文书的世界 15:40—16:40 提问	19:00—20:20 分组讨论 20:30—21:30 综合讨论
18 日	9:00—10:30 卞利/明清徽州的村规民约与乡村治理 10:40—11:40 提问	14:00—15:30 阿风/从徽州诉讼文书看明代的审判制度 15:40—16:40 提问	19:00—20:20 分组讨论 20:30—21:30 综合讨论
19 日	9:00—10:30 范金民/商为名高，士为厚利：明清徽商与江南文化 10:40—11:40 提问	13:30—15:00 常建华/徽州宗族组织形成的若干问题 15:05—16:35 郑振满/民间文献与田野考察 16:40—17:40 提问	19:00—20:20 分组讨论 20:30—21:30 综合讨论
20 日	9:00—10:30 郑培凯/汤显祖与徽州 10:40—11:40 提问	14:00—15:30 徐澄琪/徽商、徽墨、徽山水：黄山与新安画派 15:40—16:50 提问	19:00—20:20 分组讨论 20:30—21:30 综合讨论
21 日	9:00—10:30 龚书章/徽派建筑 10:40—11:40 提问	14:00—15:30 劳格文/齐云山与道教 15:40—16:50 提问	自由活动

续表

日期	上午	下午	晚上
22 日	上午从上海前往屯溪	许国牌坊、渔梁坝 （水利设施）	屯溪老街（自由活动）
23 日	黟县宏村（皖南古村落，世界文化遗产）	休宁万安老街 （徽州市镇、徽商慈善事业）	19:00—20:20 分组讨论 20:30—21:30 综合讨论
24 日	齐云山（道教名山）	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	19:00—20:20 分组讨论 20:30—21:30 综合讨论
25 日	婺源理坑	清华彩虹桥 婺源县博物馆	17:00—19:00 综合座谈 19:10 晚宴
26 日	参观棠樾（盐商故里）	午饭后解散，可从杭州离开，或回上海	
27 日	赋归		

十、报名须知：

（一）欲参加研习活动者，请于即日起至 2012 年 4 月 30 日（周一）17:00 前，至活动网站下载报名表完成报名。2012 年 5 月 10 日（周四）17:00 后于网站公布录取名单。

（二）报名方式：

※ 一律以电子邮件报名，不接受纸本或其它形式之数据。

※ 大陆学员报名请寄：wsyjy@ fudan. edu. cn 金秀英老师；台湾学员报名请寄：alyosha@ asihp. net 张雅芳小姐

※ 报名信件标题格式为：学员姓名—报名“第二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例：王大明—报名“第二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

※ 随信请备妥下列档案，以备审查：（1）报名表：请至活动网站下载（见十一、活动网站与联络信息）；（2）自传：约 500—1,000 字，含个人简介与学术专长（或研究兴趣）；（3）近五年代表文章一篇：会议论文、学期报告皆可，三万字内为宜；（4）个人照片一张（大头照或可供清晰辨认之生活照）

（三）学员筛选方式：报名截止后，若人数超过预定名额，将以学员报名文件之内容为审核是否符合本次活动主旨之依据。

（四）无法全程参加者请勿报名。录取者若因故无法参加本研习营，请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周二）前通知主办单位，俾以通知备取递补。

（五）2012 年 9 月 30 日前，学员需递交研习心得报告一篇（一至二千字）。学员作品将于活动网站公开，以供观摩交流。

十一、活动网站与联络信息：

（一）报名表下载、课程内容与公告详见活动网站：http://www. ihp. sinica. edu. tw/ ~ CScamp/（史语所）或 http://www. iahs. fudan. edu. cn/（文史研究院）。

（二）联络信息：

大陆：金秀英老师，电话/传真：（21）5566-5284；电邮：wsyjy@ fudan. edu. cn。

台湾：张雅芳小姐，电话：（02）2782-9555#351；电邮：alyosha@ asihp. net。□

2012 年文史研究院专职研究员、博士后人员招聘启事

• 专职研究员(引进)

招聘名额 专职全聘研究员 1 名

研究方向 东亚跨区域历史研究,中国艺术、思想与文化史研究等。

招聘条件 具有博士学位,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学术功底;已在核心和权威期刊上发表过若干篇有创见的学术论文,并出版过专著;掌握一门以上外语;50 岁以下;具有团队合作精神。

招聘范围 国内、国外

岗位待遇 以全聘方式进入文史研究院,按照学校统一规定核定薪酬。

申请材料 a. 本人简历(含 2 寸报名照一张);b. 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c. 尚任职证明复印件;d. 重要著作和论文复印件(著作有目录和版权页即可,论文则须有发表刊物的封面、目录与正文,两者最好能含被收录引用等情况的说明);e . 重要获奖证明复印件。

联 系 人 金秀英 电话/传真:(86)21-5566 5284;电子邮箱:wsyjy@ fudan. edu. cn;邮寄地址:200433 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截止时间 2012 年 10 月 31 日

• 博士后人员

申请条件 凡在国内外获得博士学位,品学兼优、身体健康,博士毕业年限不超过 2 年,年龄一般在 40 岁以下的优秀青年均可申请。

申请材料 a. 本人简历;b. 博士学位证书(复印件)或其他相关的有效证明文件(应届毕业生可先递交申请表,待论文通过答辩后,再递交论文通过答辩证明或博士学位证书复印件);c. 博士论文全本;d. 硕士、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一览;e. 本人拟在博士后期间从事的研究课题及计划。

研究方向及合作导师

1. 思想史与文化史、亚洲文化与历史研究 葛兆光教授
2. 考古与艺术史 李星明教授
3. 中外关系史、中亚史 芮传明教授

联 系 人 肖军 电话/传真:(86)21-5566 5284;电子邮箱:xjfd @ fudan. edu. cn;邮寄地址:200433 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截止日期 上半年:2012 年 3 月 31 日;
下半年:2012 年 10 月 31 日。□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纪事

（2012.01—2012.03）

• 2012 年 1 月 11 日

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李若虹与顾问 Linda Grove（日本上智大学）来访，葛兆光教授、王振忠教授接待，向客人介绍文史研究院的情况，并参观院资料室。

• 2012 年 1 月 12 日

朱溢副研究员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做题为《公私之间：唐宋时期太庙祭祀的变迁》的学术报告。

• 2012 年 1 月 14 日

朱溢副研究员在大阪市立大学参加平田茂树教授主持的宋代史谈话会，并做题为《走出郑、王之争：唐宋郊庙礼制的发展趋势》的报告。

• 2012 年 1 月 16 日

我院组织“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博士招生方向的申请材料评审，有 5 名申请者进入面试。

• 2012 年 1 月 30 日—3 月 29 日

王振忠教授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担任客座教授，主持“明清社会文化史研究”十二讲，主要内容包括：徽州文书研究、“社会史视野中的域外文献：日本长崎唐馆图透视”、“清代朝鲜燕行使者的中国观感：以李德懋《入燕记》为中心”和“唐话课本：明清时代东亚的商业贸易与社会生活”等。

• 2012 年 1 月

“复旦文史专刊”第四种《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由中华书局出版。

《复旦学报》2012 年第 1 期刊载邓菲副研究员的论文《图像与思想的互动——谈跨学科研究中的图像艺术》和朱溢副研究员《唐至北宋时期的太庙禘祫礼仪》。《思想》第 20 辑刊载葛兆光教授的论文《前近代、亚洲出发思考与作为方法的中国：重新理解沟口雄三教授的一些历史观点》。

王振忠教授受安徽省黄山市徽商文化研究会之聘，担任《徽商大典》学术顾问。

• 2012 年 2 月 8 日

王鑫磊助理研究员在韩国首尔参加“韩国高等教育财团 2011—2012 年度国际学者支持计划中国学者研讨会”，并做题为《帝国斜阳下的亲密接触——论朝

鲜王朝官员金允植的天津领选》的学术报告。

- **2012 年 2 月 20 日**

王鑫磊助理研究员结束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为期半年的学术访问回国。

- **2012 年 2 月 22 日**

复旦大学林尚立副校长来我院就人事方面的若干问题与葛兆光教授商谈。

- **2012 年 3 月 1—4 日**

葛兆光教授应邀赴杭州师范大学,为“恕诚讲座”讲演《亚洲史研究的方法》,杭州师范大学副校长何俊教授主持。

- **2012 年 3 月 9 日**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成立,葛兆光教授应邀参加成立仪式并受聘为该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下午,在同日开幕的“价值与意义:中华文明的再认识”学术论坛上做学术演讲,题目为《在文明与文化之间:传统中国文化的困境与选择》。

- **2012 年 3 月 9—10 日**

王鑫磊助理研究员赴韩国首尔参加成均馆大学历史系主办的“传统学问的瓦解与东亚”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表题为《从“绅士游览团”到“天津领选”——韩国史料中所见之东亚近世变革》的论文。

- **2012 年 3 月 10 日**

我院举行“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博士方向的招生面试,本学年正式录取 3 名。

我院学术顾问、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朱维铮先生辞世。

- **2012 年 3 月 12 日**

上海人民出版社王为松总编辑率编辑一行来我院,与葛兆光教授、董少新副研究员讨论“中国学术史经典论著精读丛书”的出版事宜。

- **2012 年 3 月 13 日**

葛兆光教授参加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召开的关于跨学科博士项目的座谈会,并就我院“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博士项目向研究生院作了汇报。

下午,“交错的文化史”工作室举办第十二期研习班,王鑫磊助理研究员做题为《从“绅士游览团”和“领选使”看东亚的现代化——兼谈韩国在东亚历史研究中的地位问题》的报告。

- **2012 年 3 月 19 日**

葛兆光教授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做题为《谁是六祖?——读〈唐少林寺释法如行状〉碑》的学术演讲,陈金华教授主持。

- **2012 年 3 月 20 日**

葛兆光教授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第三年度的客座教授。

我院举办第四十七场小型学术研究会,张佳助理研究员做题为《塑造正统:明初的“胡服”禁革》的学术报告,朱溢副研究员主持。

- **2012 年 3 月 27 日**

“交错的文化史”工作室举办第十三期研习班,我院博士后朱坤容做题为《日僧道元从中国带回了什么?——试论日本早期曹洞宗宗风之成因》的报告。

- **2012 年 3 月 28—30 日**

李星明研究员应邀赴西安参加由陕西历史博物馆主办的“古代壁画的保护与研究”学术研讨会。

- **2012 年 3 月 28 日—4 月 28 日**

张佳助理研究员赴美国圣路易斯市华盛顿大学人文中心访问。根据我院与华盛顿大学文理学院达成的合作协议,每年将互派研究人员展开学术交流。

- **2012 年 3 月 29 日**

葛兆光教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艾尔曼教

授主持的东亚史讨论班上，做题为《中国道教、日本神道教与天皇称号》的讲座。

- **2012 年 3 月 30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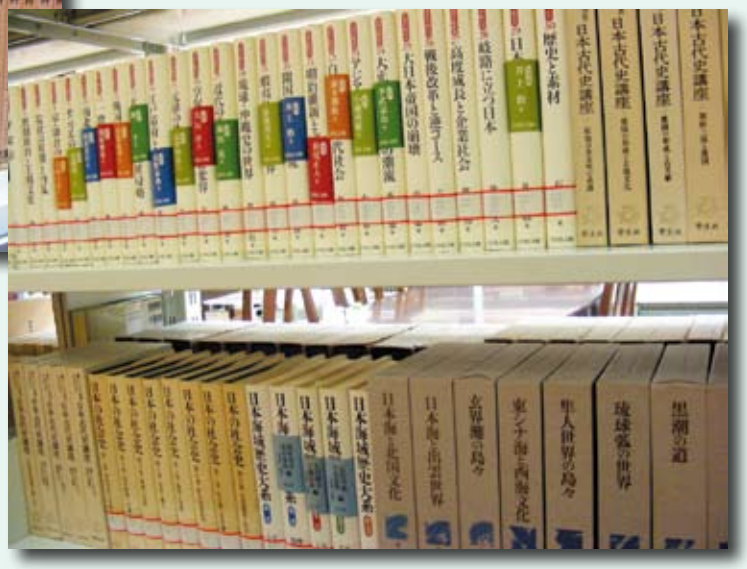
我院举办第四十八场小型学术研究会，朱莉丽助理研究员做题为《日本遣明使记录下的明中叶江南城市和城市生活——以宁波为中心》的学术报告，王鑫磊助理研究员主持。

- **2012 年 3 月**

高等教育出版社、荷兰 Brill 出版社合编的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中国历史学前沿》）杂志第 7 卷第 1 期，刊载葛兆光教授 2011 年 4 月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中心所做讲演《衣冠、典礼与东亚秩序》英文稿，此期同时刊出美国罗文大学王晴佳教授评葛兆光教授著《宅兹中国》的书评。《中国学术》第 9 卷第 2 辑刊载朱溢副研究员的书评《评雷闻著〈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史林》2012 年第 1 期发表刘震副研究员的《德国佛教艺术史研究方法举隅：以九色鹿故事为例》、董少新副研究员的《论徐光启的信仰与政治理想——以南京教案为中心》及马小鹤特约研究员的《从“五明性”到“五明大供”》三篇论文。

孙英刚副研究员的研究课题《纬学思想与隋唐时期的政治合法性研究》获 2012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立项。□

金秀英　整理



2012年春季，文史研究院资料室从日本购进一批亚洲历史、宗教与艺术方面的文献资料及研究著作，其中包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オランダ商馆长日记》（24册）、《イギリス馆长日记（7册）与《イエズス会日本书翰集》（6册）；日本基督教史学会编《基督教史学》（45辑）、吉川弘文馆“日本时代史”系列丛书（30卷）、岩波书店《东南亚史》（10卷）、辛基秀编《大系朝鲜通信使》（8卷）、清文堂《日本海域历史大系》（5卷）等，以及森克己、石母田正、井上光贞等学者的著作集，计296册。

2012年3月，资料室购进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备边司誊录》（全28册）以及《通文馆志》（上、下卷）。

封面题字　秦绍德

封面底图　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狩野光信

《肥前名护屋城图》屏风

编　　辑　杨琴　肖军

地　　址　上海市邯郸路220号　200433

电话/传真　86-21-5566 5284

邮　　箱　wsyjy@fudan.edu.cn

网　　站　www.iahs.fudan.edu.cn